

# 服务型政府必然容不得“平主任”

官腔主任的冤情值得同情吗? 7月14日 华商晨报 傅万夫

## 华商晨报一评

被呼为“官腔主任”的江西省防汛办副主任平其俊喊冤:“我的专业是技术,平时认真做事。我是什么样的人,大家都知道。得到这个骂名,我心里觉得有点冤。”

(7月13日《中国经济周刊》)

按照平主任的解释,领导指示有两页纸之多,如果全部念完至少得六七分钟,他在3分钟内念了那么多领导指示,还顺道回答了主持人两次打断汇报而提出的问题,已经有很大突破了。

而且打官腔的官员很多,水平比平主任高的也不少,可为啥不骂别人,反倒给自己扣上一个“官腔主任”的大帽子呢?难怪平主任觉得自己很冤。

可平主任真的冤枉吗?从平主任的极力辩解中,我们能够获取一个信息,那就是:直到现在他都不知道,当时人们最需要的是专业的汛情信息以及权威的逃生指导,而非领导指示。也就是说,平主任当选“官腔主任”并不冤枉。

试想一下,在那种生死一线间的时候,领导的指示能堵住决口吗?

能让人突然从危险地带腾空飞到安全地方吗?也许是区分自己并非善于打官腔的老油条,平主任一再强调自己是搞技术的。

其实,这种辩解要远比说官话更要命,因为作为一名技术干部,在防汛最关键时刻,就应该展示出其在防汛方面的专业性与权威性,可是我们丝毫没有从那短短3分钟的连线里,听到他的技术分析,反倒是体会了他说官话的功底,平主任是不是有渎职之嫌呢?

“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,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”,号称自己是技术干部的平主任,需要的不是到处喊冤,而是应该反思,为什么自己技术干部的身份和特色,只能通过类似王婆卖瓜之类的自夸才被人了解。

这让我很怀疑平主任的技术干部身份,以及那句“认真做事”的真实性。

## 现代快报再评

在过去的管理型政府治下,政府大于社会,“领导指示”一直是重要而突出的新闻内容,非此不足以显示抗灾的政绩与决心。

新闻报道的重点则应是公众关心的灾情本身,是对问题的分析。不过,“官腔主任”对此称谓感到委屈,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。

平其俊如果不这样做,难保不引起某个上级领导的不满。看来要想真正消除这种官腔,关键还在加快管理型政府的转型。

平主任面对镜头的官腔,是一种下意识,他事后的喊冤,同样是一种下意识,这只能证明,“为民服务”对一些官员来说,仍然是陌生的词汇。人们对平主任风波这么关注,当然也是因为大家都知道,一些官员如此的下意识,已经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候了。

# 与民争利 致富障碍

浙江义乌市一些公务员为“当农民”,把户口迁到农村。原来,他们看中的是农村户口所附带的征地补偿费、集体经营分红等利益。目前200多名拥有农村户口的公务员,被要求从农村迁出户口;对拒不配合者,先免职再清理其农民身份;今后再出现这种情况,市管干部一律免职。

(7月13日《今日早报》)

公务员假扮农民两头占  
便宜太缺德 7月14日 新京报 徐明轩

## 新京报一评

按我国的户籍制度,将户口落在农村,就意味着成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,拥有了村集体经济所有土地份额,还能享受集体经济分红等经济权利。像义乌这样的沿海经济发达地区,农村户口的“含金量”很高。一旦把户口迁入农村,就会分走集体经济中的一块蛋糕,挤占了其他村民的利益。

由于城乡二元制度,农民没有基本工资,医疗保障体系又长期缺位,直到近年才由于土地增值和国家惠农政策,日子才变得好起来。相反,公务员则属于干部编制,一直享受城镇户口的种种福利。现在,一些公务员两头占便宜,无疑是不公平的。

从报道中看,户口在农村的公务员大约有两类。一是户口一直留在农村的,比如部分上世纪80年代初乡镇招聘的干部、村干部考上公务员未迁户口的。另一部分人则是利用权力把城镇户口迁到农村,侵占村民集体利益。“伪农民”不仅侵蚀了村民利益,更在损害着公职人员的廉洁性。

城镇户口的普通居民将户口迁到农村后,就无法享受城镇社保,而公务员的社保则由国家全额买单。碗里吃的本来就不少,还要把筷子伸到锅里,享受农村户口的红利,自然是不公平中的不公平。公务员本该为社会公平做出表率,绝不能利用自己分粥人的身份谋取私利。

## 现代快报再评

三农问题一直是专家们研究的课题,其实质就在一个穷字。改革开放前,占人口多数的农民就处于社会最底层,享受不到城里人的诸多福利。不公平的户籍制度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,许多地方迄今仍实行的城市暂住证,就主要是针对农民的。义乌市一些公务员的做法,可见官员与民争利已经成为农民致富的阻力,让人不由想到元曲《醉太平》所唱:“鹤唳寒风,鹭鸶腿上劈精肉,蚊子腹内割脂油。亏老先生下手!”如果不对此及时加以制止,国家惠农政策完全可能会付之东流,农民的贫困状态将会依旧。这件事再次说明,所谓三农问题其实并不复杂,改变农村的贫困不过就是个政策和执行政策的问题,以及农民能否维护自己权利的问题。

# 那些紧张的官员,其实也很“陈凯旋”

什么让陈凯旋成为惊弓之鸟 7月16日 长江日报 雷志华

## 长江日报一评

湖南宁乡县农民陈凯旋向温家宝反映当地出现塌陷的问题,并带总理到了塌陷的现场。当晚,镇上流传说,派出所要抓陈凯旋,陈凯旋当即从家里跑掉,三天没敢露面。

(7月15日《新京报》)

都说“冲动是魔鬼”,农民陈凯旋的遭遇或许形象地诠释了这一句话。不仅连日担惊受怕、半夜出逃,以至于最后亏本将安身立命的菜店转让……

陈凯旋的担惊受怕,难免让人想起了契诃夫的《小公务员之死》。一位生活安逸的公务员,仅仅因为一个喷嚏,最终在自我惊吓中命丧黄泉。按照当地镇干部的话来说,陈凯旋实属多虑,人家不过想在深夜了解他是怎样见到温总理的罢了,并无抓人之意。

当地为了抚慰陈凯旋,县委还开了会,要求大成桥镇党委书记务必与陈凯旋面谈一次,希望陈凯旋不要有思想包袱。令人搞不懂的是,缘何陈凯旋“身上的包袱”就这么重,连县委开会都卸不下来。

整个事件值得质疑的地方很多。如果不是媒体的持续关注,陈凯旋还能平安无事吗?

从当时及其后的蛛丝马迹来

看,情况让人惊悚心寒。

不仅有多人提醒陈凯旋外出躲一躲,甚至其在政府工作的亲戚也训斥他说:“随便向总理反映问题很冒失,建议他出去躲躲。”透过这些细节,公众完全有理由相信,穿衬衣男子及警察“你把总理带到这里,今后你没好日子过”的警告绝非危言耸听。

同一出“戏”,不同人会得出迥异的观感。就算陈凯旋真的“胆小多疑”,那么我们更需要思索这样一个问题:究竟是什么让他生活得犹如惊弓之鸟?

追究根本,他们患了“印象病”,是现实生活给他们灌输强化了一整套卑微的“生存哲学”。横行的权力,维护权益的艰难,让他们的神经日益绷紧。久而久之,这种恐惧感便在他们心中扎根滋长,最终导致一些地方官民间的猜疑或对立。

## 现代快报再评

这篇时评引用了契诃夫的小说

《小公务员之死》,但契诃夫的幽默是含泪的微笑。

陈凯旋的故事开头像正剧,一个普通农民敢向总理反映情况,体现了他不自觉的公民意识,或者他只是本着千百年来的传统思维,职位越高的官员越能体恤民情。

接下来的故事就像小品了,但却让人笑不起来。

镇上传言说,派出所要抓他,吓得他赶快出逃。我相信当地官员深夜去找他,的确不是要抓他。舆论由此探究一个普通农民不能免于恐惧的生存,我觉得还应由此探究一下很多官员的生存状态。

按说一个普通公民与总理的邂逅交谈,完全是与他人无关的私事。当地官员只需恪尽职守,大可不必如此紧张,要不就是他们平时瞒上欺下惯了,要不就是他们自身也成了陈凯旋,同样生活在一种随时防止出事的不安之中。

在这连环套的三者关系中,大家都不是处在一个自由平等的公民社会状态。

# “贫富混居”不是可以期待的公平

与富人比邻易与富裕攀亲难 7月16日 中国青年报 胡印斌

## 中国青年报一评

在传统的熟人社会中,中国人历来讲究“择邻而居”,所谓“孟母三迁”,看重的就是比邻之间的相互影响。而在现代城市社区,此种“古风”虽有所保存,但毕竟社会已不再是那个传统的熟人社会,邻居间关系也逐渐淡薄多了。

要说“富邻居”对“穷邻居”到底能有多大影响、带动,确实不是一件能量化、确定的事情。从“富人”一方而言,也没有那样的义务。即便有,恐怕也是小概率事件。至少,这不应成为公共治理中缩小贫富差距的依据。贫富混居,只是一种居住形式,并非经济政策。它不能被赋予太多美好想象,更不能替代政府改变贫富悬殊状况的政策安排。在贫困群体的住房

权利得到保障后,还是应有其他配套政策帮助这个群体提升其经济实力,逐步改善其经济地位。仅仅住进“富人区”,仍不足以改变贫困者“边缘化”的社会地位。

贫富差距并不是贫富分居造成的,贫富混居注定不可能让穷人与富裕攀亲。根本上还应在经济政策的制定上,多给贫困者一些致富机会;在社会政策的制定上,让贫困者多一些上升通道。

如果在制度上有所改进和反省,只是通过政策强力让穷人住进“富人区”,则“富人”很可能选择“用脚投票”,去寻觅新的富人区。毕竟,大家都有选择居住地的自由。

## 现代快报再评

在一个提倡制度创新的年代,一个创意往往也能成为政绩。兰州、武

汉等城市推行贫富混居,在商住小区内修建廉租房和经适房,我觉得其本意还是好的,但它必然无法实现设计者的初衷。

今年广东省高考作文题目是《与你为邻》,如果选择贫富混居的题材,可以折射出当今社会各阶层的经济、道德面貌。

问题是,如果指望这种贫富混居就能解决贫富悬殊的社会矛盾,那解决社会问题就太容易了。正如这篇时评所指出:“当下中国的贫富差距并不是贫富分居造成的,贫富混居注定不可能让穷人与富裕攀亲。”因此,一些地方政府与其追求结果平等,不如多从起点平等考虑,让贫困人群能在公平正义的环境中,通过努力去改变自身。否则,那些配建在商住区的经适房,总有一天还会呈现出破烂的颜色来。

本版特约主持人 景凯旋

南京大学教授、著名专栏作家,译有米兰昆德拉《为了告别的聚会》《玩笑》《生活在别处》,克里玛《布拉格精神》《我快乐的早晨》及《地下——东欧萨米亚特随笔》等著作